

刘家泉 著



宋庆龄

流亡海外岁月

宋庆龄流亡海外岁月

蕭華題



刘家泉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宋庆龄流亡海外岁月

著 者/刘家泉

责任编辑/徐永军

封面设计/谭德山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地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燕华印刷厂

850×1168mm 32开 9印张 220千字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ISBN 7-5073-0209-1/K·51 定价:10.50元



1927 年，
在莫斯科与国
民党左派领袖
邓演达(右二)
等合影。

1928 年 5 月 2 日，
德国外交部把德国驻苏
联大使馆要求对宋庆龄
在德国的行动作不引人
注目的监视的密报抄送
给德国国家公安监察委
员会主席。

utsche Botschaft
IV Chi 542.

Moskau, den 28. April 1928.

gb. Pa/Sun Soeng Ching - Ling

RYLT.

halt: Paßsache der Witwe Sun Yat-sens

Geheim.

Frau Sun-Soeng-Ching-Ling

(hat mit 4497/27 in Moskau 1928)

Auf Antrag des Volkskommissars für Auswärtige Angelegenheiten wurde der Witwe Sun Yat-sen's, Frau Anna Sun-Soeng Ching-Ling mit Rücksicht auf das Telegramm No. 841 vom 12. Dezember u. J. ein dreimonatiger Ein- und Wiederausreisestichtvermerk erteilt.

Frau Sun-Soeng-Ching-Ling konnte im vergangenen Jahre krankheits halber die Reise nicht antreten. Sie begibt sich jetzt zwecks Heilung eines Augenleidens nach Deutschland und beabsichtigt ihren Aufenthalt bis zu einem Jahre auszudehnen.

Die Rolle, die Frau Sun-Soeng-Ching-Ling auf kommunistischer Seite in der nationalchinesischen Bewegung in China gespielt hat und ihre engen Beziehungen zu hiesigen Parteikreisen lassen es meines Erachtens geboten erscheinen, daß ihr Fun in Deutschland unauffällig überwacht wird.

das
Auswärtige Amt, Berlin.

I. A.

gez. Hey

Berlin, den 2. Mai 1928.

Auswärtiges Amt.

IV Chi 542.

Abwehr istlich

dem

Herrn Reichskommissar für Überwachung der öffentlichen Ordnung

mit dem Anheftstellen ergebenst überandt, eine unauffällige Überwachung der Frau Sun zu veranlassen. Von hier aus wird Wert darauf gelegt, daß dabei größte Vorsicht obwaltet.

Im Auftrage

Handwritten signature



宋庆龄曾居住过的柏林里城堡大街七号寓所。



1929年5月，回国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礼前摄于德国。



1929年6月1日，在孙中山国葬仪式的送葬行列中。

Verbalnote.

Die Chinesische Gesandtschaft beehrt sich dem Auswärtigen Amt unter Bezugnahme auf das geschätzte Schreiben vom 23. Dezember 1930 - IV Chi 2589 - ergebenst mitzuteilen, dass Fräulein L.C. Koon erst jetzt von dem Inhalt desselben in Kenntnis gesetzt werden konnte, da sie längere Zeit von Berlin abwesend war. Die genannte Dame sagte aus, dass es absolut ausgeschlossen ist, dass sie ihren Handkoffer bereits vor Betreten der Wohnung Raughamer verloren habe. Die Gesandtschaft wäre daher dem Auswärtigen Amt zu Dank verbunden, wenn es die Güte hätte, die massgebenden Stellen hiervon in Kenntnis zu setzen und dieselben zu bitten, alles daran zu setzen, was in ihren Kräften steht, um doch noch den Diebstahl aufzuklären.

Die Gesandtschaft wäre dem Auswärtigen Amt verbunden, wenn es die Güte hätte, dem zuständigen Stellen ihren Dank für die in dieser Angelegenheit bisher gebotenen Bemühung Ausdruck zu bringen.

Berlin, den 15. Februar 1931.



Auswärtiges Amt
Berlin

1931年2月15日，
中华民国驻德国公使馆
照会德国外交部，敦促
德方尽快侦破宋庆龄手
提箱丢失案。



30年代初在欧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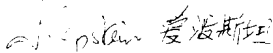
序

1988年刘家泉教授出版的《宋庆龄传》获得读者的好评。我曾为该书作序。

在这之前他已经从事宋庆龄的研究多年。此后我高兴地看到他继续从事这项研究工作。去年，他曾赴德国讲学和访问，他不辞辛劳地到德国档案馆找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与30年代初期宋庆龄居留柏林时的资料，发现了有意义的、迄今从未公布过的资料。这有助于我们从某一侧面了解宋庆龄生平中鲜为人知的这一时期的情况。这本书展示了这些珍贵资料。

我作为宋庆龄传记——《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的作者，希望有更多的研究团体和学者认真地研究宋庆龄留下来的丰富的珍贵的遗产。

刘教授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他一直充满着旺盛的精力，而且是一个勤劳的、认真严谨的研究者。他摒弃猜测，尊重事实，论据充分。他的写作风格通俗易懂，可读性强。我希望在他对宋庆龄的进一步研究中，为这一专题，并为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作出更大的贡献。


J. Edgar Hoover

1993.9 北京

自序

今天当我在案前提笔为《宋庆龄流亡海外岁月》作序的时候，心中不免颇为激动，我多年的愿望终于初步实现了。

1986年10月出版的《宋庆龄年谱》，我负责撰写该书的主要部分——1919年至1949年9月。1988年10月出版了我个人撰写的《宋庆龄传》。在撰写这些专著的过程中，我曾经跑遍了北京所有大型的图书馆，把那些沉睡在报库里满积厚厚尘土的报刊合订本一本本地搬出来，从头到尾一页不漏地翻阅，每个历史时期我都要查阅多种报刊，这些报刊的年代加起来有100多年；我还追踪宋庆龄的历史足迹访问了宋庆龄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去查阅我能够找到的档案、资料，（包括一些外文资料），寻访了几十位与宋庆龄一起战斗、生活过的亲朋故旧，这些工作使我发掘了不少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遗憾的是宋庆龄流亡海外的岁月，特别是她流亡、侨居德国时期，当时我几乎没有找到任何具体的资料。对宋庆龄1928年5月初到达柏林，至1931年7月下旬离德归国，《宋庆龄年谱》对这一时期她在德国的活动几乎没有任何具体的记载，在1930年栏内只有短短的两行字，引用的唯一资料是上海《民国日报》发的一则新闻报导：她在德国常常整日“沉缅于书藉之中”，如此而已。拙著《宋庆龄传》对这一时期总计写了不到7页，毫不夸张地说，迹近一片空白。虽然《宋庆龄传》出版以来得到社会各方好评，多次再版，获得全国优秀图书奖等三个

大奖,但不足之处仍然不少,尤以这部分为甚。每念及此,不胜惶悚、愧疚,暗下决心,今后务必填此空白,弥补缺陷。

“皇天不负苦心人”。1992年我有机会应邀到德国几所大学讲学,我抓住了这极为难得的良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发掘和搜集到了不少记载宋庆龄流亡德国期间经历的档案资料。本书披露的资料,有些是把沉睡在德国国家档案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珍贵资料第一次公诸于世,可称得上是“独家新闻”;有些档案资料在德国朗朗·费勃尔教授等用德文所写的《在柏林的中国民主和革命人士(1925——1933)》一文中曾提到过(我是1989年赴日本讲学时找到这篇文章的),这次去德国我查到了这些档案资料的原文,对我来说不但算得上是“二手”变“一手”,而且掌握的内容也更详尽了。宋庆龄申请赴德国访问时,德国政府鉴于作为孙大总统夫人和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宋庆龄是国际工人救援组织的中央成员,又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创建民国的运动中均起着重大的作用,所以在批准发给她来访签证的同时,又深感不安,决定“以非常小心谨慎的原则”布置暗探对她进行“悄悄地盯梢”。德国官方商讨宋庆龄申请来德访问一事,并决定对她监视的有关文件以及暗探的监视报告正成了今天珍贵的档案资料。本书“的士揭秘”一章则是根据德国外交部、内政部、国家公安监察委员会、普鲁士州内政部、普鲁士州法院最高监察官、柏林警察局等为了侦破宋庆龄丢失装有贵重物品的手提箱所写的官方报告、信函,以及当时中华民国驻德国公使馆与德国外交部互致的照会写成的。这些历史留下来的珍贵的第一手档案资料显然是真实的。虽然写作本书时在这些珍贵资料的基础上作过一些加工,但

主要情节都是真实的,因为我一向认为真实性是写作历史人物传记的第一要义。或者说,真实性是写作历史人物传记特别是伟大人物传记的生命。这次赴德讲学搜集到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为填补研究宋庆龄流亡海外,特别是侨居德国时期的空白,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由于时间和条件所限,我搜集到的资料仍然是不完全的,只是希望本书能为更多、更好的有关著述的出现起一点铺路石的作用。

本书记述了宋庆龄 1927 年 8 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秘密出走莫斯科,悄然离苏,流亡德国,到 30 年代初结束流亡,回国参加爱国民主斗争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不平凡经历。在这段历史中,宋庆龄写下了不少动人、壮丽的历史篇章,最能反映她那挺拔轩昂的气度、刚毅坚强的风貌和在艰难险阻中从不后退,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高洁品德,以及具有“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世界文豪肖伯纳语)。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拙著《宋庆龄传》的补充和提高。由于水平和时间所限,本书不足之处定然不少,如蒙热心读者指正,不胜感谢。

同时我还要感谢为此书问世提供过帮助的海内外女士、先生、教授、学者,特别是德国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与宋庆龄有 40 多年战斗友谊的中国人民的挚友爱泼斯坦为本书作序,宋庆龄基金会主席、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为本书题写书名,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对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和同志为本书的早日问世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谨致谢意。

作者

目 录

序.....	1
自序.....	2
第一章 秘密出走.....	1
一、秘密出走的背后	2
二、在莫斯科的国宾.....	15
第二章 离苏内幕	28
一、一支暗箭一次葬礼.....	29
二、“不再在莫斯科多呆”.....	34
第三章 盯梢下的流亡生活	49
一、在柏林,被“极其谨慎监视”	50
二、巴黎、维也纳、海德堡.....	74
第四章 奉安大典	89
一、归心似箭 故人情深.....	90
二、碧云寺“奉移” 紫金山“奉安”	104
三、西湖“卜居” 再出国门	130
第五章 “的士”揭秘.....	138
一、乔迁与失窃	139
二、窃案揭秘与透视	151
第六章 冷遇与友情.....	163
一、在柏林的一段遭遇	164
二、突传噩耗,匆离柏林.....	180

第七章 回国战斗 保障民权·····	187
一、组织民权保障同盟·····	188
二、挺身而出 “登堂入室”·····	192
三、杨铨被害 斗志弥坚·····	204
第八章 救国入狱 震惊中外·····	212
一、“全救会”全力捍卫·····	213
二、隆重的“民族的葬仪”·····	221
三、挺身营救“七君子”·····	227
四、救国入狱 非同凡响·····	235
宋庆龄大事年表(1927—1937 年)·····	246

第一章

秘密出走

为了争取宋庆龄，蒋介石频遣信使游说敦请，“痛哭陈词”，更不惜“御驾亲征”，表示“中正等望夫人来沪，如望云霓”。宋子文拿出可任意支取的支票。反共将领何键派兵搜查宋庆龄在汉口的住宅。

宋庆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秘密出走。远离祖国亲人，也不免涌现一丝江淹在《别赋》中吟诵的情怀。

在“陪同团团长”柯伦泰夫人陪同下的“国宾”。莫斯科人争睹孙夫人风采。

一、秘密出走的背后

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火车站是苏联最长的铁路线——全长 9000 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线的起点。它虽然比不上莫斯科历史最悠久的列宁格勒车站和规模最大的喀山车站，但由于是苏联最长铁路的起点而远近闻名。这个在 20 世纪初期由建筑学院院士谢赫捷里设计，带有小阁楼般尖形屋顶的火车站尽管说不上宏伟，但也风格别致，具有特色。

1927 年 9 月 6 日，平时并不拥挤的雅罗斯拉夫车站却人潮汹涌，站台上站满了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工会、妇女团体、共青团的代表和中国侨民的代表。站台上欢迎人群中举着用中文写的“欢迎革命的领袖宋庆龄”的巨大横幅，和穿着笔挺制服站在人群前面的军乐队，使人们直觉地感到这个车站欢迎贵宾的隆重气氛。

列车徐徐进站时，欢迎队伍顿时爆发出“乌拉！乌拉！”的热烈欢呼声，宋庆龄在乐队高奏《国际歌》的雄壮乐曲声中步出车厢。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工作操劳、和纵贯日本海、横穿西伯利亚的旅途劳顿，她瘦了许多，但清癯的脸庞上镶嵌一双闪亮发光的眼睛，微笑中脸颊泛起深深的酒窝，仍显得满面春风，精神焕发。

她终于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托付的访问莫斯科的遗愿，心情十分愉快。

今天到车站欢迎宋庆龄的苏联政府代表有：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教育人民委员柯伦泰夫人、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

加拉罕、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波波夫等。

人群为了争睹宋庆龄的风采，把她里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围住。尽管有纠察队在维持秩序，但想瞻仰一下这位孙中山夫人，国民党左派领袖丰姿的人们，仍然争先恐后地奔跑着向前涌去。有些挤不进去的人还攀上站台的柱子，瞧上一眼再顺着柱子溜下来，出现了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少有的动人情景。

出站后，宋庆龄在李维诺夫、柯伦泰夫人等的陪同下，乘车赴莫斯科红场对面专门招待政府贵宾的豪华的大都会饭店下榻。

对宋庆龄的来访，苏联政府不但给予国宾般的隆重欢迎，且作了“周密的安排”。她从海参崴到莫斯科坐的是特别调拨的专列——过去沙皇专为要人们准备的豪华镀金卧车。途中由苏联高级官员组成的护送小组进行周到的照料，车厢里经常摆满当时对一般苏联人来说是奢侈品的各色新鲜水果，途经贝加尔湖时餐桌还不时摆上刚捕捞上来的美味的白鱼，更有宋庆龄爱喝的龙井茶、香片茶，真是香茶喷暖气，鲜果散幽香。车厢里充满着温馨、和谐的气氛，多少冲淡一点游子思乡的情怀。到了莫斯科，外交部给她专门调拨了高级轿车。政府阁员、教育人民委员，柯伦泰夫人担任了负责照料宋庆龄在苏生活的招待组组长。如果作为孙大总统夫人的宋庆龄当时在苏联得到准元首的接待规格，那么柯伦泰夫人也就相当于现在的陪同团团长了。柯伦泰夫人虽然出身于贵族家庭，但却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又是苏联有名的妇女领袖，曾受到列宁的器重。她的英语很好，与英语流利的宋庆龄有“共同语言”，常常一起谈形势、扯“家常”，真可算得上“一见如故”。苏联政府选派柯伦泰夫人当宋庆龄一行的“陪同团团长”，可谓煞费苦

心深得其人。

宋庆龄受到如此隆重的接待，不但因为她是首创民国的中国第一任大总统、与列宁结下深厚情谊的孙中山的夫人，而且也是在蒋介石、汪精卫等分共后敢于高举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旗帜的杰出代表。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宋庆龄并不是作为失败的逃亡者来到莫斯科的。尽管如此，她从上海出走时确实有点“悄悄逃亡”的传奇色彩。

宋庆龄访问莫斯科是实现先总理遗愿，照理应得到各方热情欢送才是，为什么却要悄悄“逃亡”，秘密出走？！

要讲清这一点，就不能不作一点历史的“倒叙”。下面，让我们看一看，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中国的情势和武汉政府的演变以及宋庆龄在此前后的遭遇和经历。

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政变，实行反共清党。对这种倒行逆施、背叛革命的行为一开始就遭到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一致谴责。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下令全国将士及群众团体将蒋捕获归案。22日，宋庆龄与邓演达、何香凝、徐谦、孙科、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吴玉章、经亨颐等共40人，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发表了《讨蒋通电》，汪精卫及其妻子陈璧君均签名其上，汪还在一次演说中高呼：“反共就是反革命，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他这种积极的反蒋姿态，当时的确赢得了国民党左派、一部分中